

廣東文史資料

第 十 輯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廣東文史資料

第 十 輯

(內 部 發 行)

1798/1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1963年10月

广东文史资料

第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州市解放北路22号

· *

广东人民出版社印刷

1963年10月出版 定价0.80元

編輯 凡 例

一、本選輯刊印的目的在於保存和積累歷史資料，並推動撰寫資料工作的開展。所選的資料大都是撰寫者的親身經歷和見聞，有一定的史料價值，但由於每個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所述史實可能不盡翔實，觀點可能不盡正確，因此，本選輯只在內部作為不定期刊物發行，以供歷史研究工作者的參考。

二、本選輯所選的資料包括從清末到全國解放各個時期的歷史的各方面，不拘體裁，只要有史料價值，均可選入。

三、本選輯所刊印的資料歡迎閱者提出補充和訂正。

四、本選輯對來稿可加以選錄、刪節和文字上的修改。

目 录

六十自述.....李章达遺稿 (1)

回忆李章达先生 (四則)

.....何香凝、蔡廷鍔、何思敬、尹翠薇 (12)

陈济棠提倡讀經和我审查《孝經新詁》

經過.....許崇清 (27)

陈济棠編印《經訓讀本》經過內幕.....譚太冲 (33)

莫荣新在广东的失敗.....彭智芳 (37)

反袁討龙活动在香港的一些回忆.....范 准 (48)

莫肇宇在潮梅反袁与投段始末.....莫孝同 (52)

旧桂系統治广东时期李根源在

韶关海南的活动及其失敗.....黃宗儒 (60)

海南文昌反袁斗争片断.....汉 新 (74)

莫荣新破坏軍政府募兵.....陆丹林 (78)

李耀汉和肇軍.....汪祖泽 (82)

陈济棠进攻筠門岭紅軍的內幕.....曾其清 (89)

十九路軍参加江西“围剿”經過.....云应霖 (96)

参加十九路軍“二次围剿”的回忆.....李汉冲 (106)

在粵东阻击叶、賀紅軍經過.....李 振 (115)

苏世安、蓝玉田在閩西阻击叶、賀之役……林志光（118）
蒋介石利用俞、李倒桂我聞……賴 刚（123）

知用学社和知用中学……张瑞权（130）

关于岭南大学工学院的一些回忆……馮秉銓（139）

广东师范教育制度的变迁……黄 佐（143）

我所知道的两广工业学堂……李敦化（150）

从“工专”到“勸大工学院”……李松生（155）

西南航空公司的成立及其結束……闕宗驊、郑厚邦（162）

清末民初广东盐务鱗爪……孔昭晟（172）

三次赴美和侨美二十五年的亲历……陈 科（182）

清末以来的广州娼妓……刘国兴（197）

六十自述

李章达（遺稿）

在我刚过六十岁之时，伟大的中国，已脱离灾难的深渊，中国人民是站立起来了。

六十年不算不长，但比起中国人民受苦的一百年来，它还是短些。自从帝国主义入侵以来，中国人民在苦难中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前仆后继，再接再厉，直至今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团结四大阶层，完成历史上伟大革命任务。在这样伟大时代，置身于光辉的革命行列，同每个中国人民一样的我，从黑夜走到黎明，那是多么愉快啊！

我们老年人的一代，是苦难中国的一代。我生在破落地主之家，十岁以前，我父母相继死亡了，以后依靠叔父生活。在东莞县城读完了“子曰馆”进入“大馆”，（即满清时的高级私塾）考过两次县试。到了十六岁那一年考进了广东陆军小学校，就在那时加入孙中山所领导的同盟会，在学校里做宣传反清的革命工作。三个年头毕业后，升入南京陆军中学，在陆军中学两年间，时势演变很速，以四川为首的各地掀起了反帝的“争路潮”，穷苦的人民四处暴动，这是武昌起义的前夕。那时，我已负担同盟会秘密组织工作，与同盟会老干部谭人凤联络，这是我比在陆小时进一步的实践革命生活。我还记得同盟会宣言中有这样激动人心的名句：

“滌二百六十年之腥膻，复四千年之祖国，謀四万万人之福

社”，它号召了全国青年为脱离异族統治光复祖国而奋斗。

1911年10月10日，长江部分革命組織連合当地軍人起义于武昌。其时，我刚在南京陆中举行毕业考試，一聞消息，便馬上帶領全組同志离校赶赴武昌，結合武昌陸軍中学的同学们編成武装队伍，充当黄兴卫队。第一次开赴前綫作战，是在汉口龙王庙碼頭登陆，战斗半日，不利而退回武昌，其后又随着黄兴进攻大智門車站的清軍，未能击破敵軍馮国璋的防御，退到汉阳，駐守兵工厂。将近一月，而有所謂“南北議和”。黄兴赴上海，我們这一队黄兴的卫队，无形瓦解，我于此时悵惘地回到广州。

本来自武昌起义后，各省宣告独立，革命軍占領了南京，成立临时政府，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如果当时革命領導人物能够不动摇、不妥协，革命事业或不致迅速失敗。但是大多数的革命領導者滿足于一时的胜利，主张南北議和，而孙中山先生就不能不耻位于袁世凱。这是政治上一大錯誤（后来孙中山致苏联齐采林书所坦白承認的）。

在我当时看来，能够認識这一錯誤的，似乎只有朱执信先生。朱于辛亥之次年（即民国元年）在广州即着眼于紧靠民軍，編練与整頓民軍作为建立基本革命武装，自然他收編了不少农村中的綠林人物，因为他反对利用旧軍閥作风，他根本不相信当时由巡防营陸軍等轉变过来的那些队伍。他为着要把起自民間的民軍健全起来，于是派出了若干有革命思想的陸軍学生到各民軍队伍中担任教練員，我就是其中之一，我是教練順德綠林首領黎炳球这一營的。其时广东都督陈炯明态度与朱相反。且对民軍首領屢加迫害。石錦泉被杀了，王和順、陆兰清被驅逐了。我在广州始終追随朱执信先生工作，我觉得当时国民党領導人物中，他是最可敬佩的一人。

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宋教仁被刺死，六月間孙中山到日本从新組織中华革命党，中山左右高級干部多数怀疑这一举动，而朱执信則坚决拥护。七月，李烈鈞举兵湖口，各地响应組織討袁軍，当时我参加李烈鈞的行列，失敗后，逃到上海。

經過袁世凱称帝，唐继尧独立，所謂“护法之役”，一九一六年李烈鈞率部与桂軍到达广州驅走龙济光，我当时在李烈鈞統率下的滇軍任少校參謀职。直至一九一八年，陈炯明在汕头成立“援閩粵軍”，邓鏗任总參謀长，我就轉到邓鏗幕下任少校參謀。随軍进攻福建，我参預漳州江东桥之战役。但当漳州占領之后，陈炯明即安于富庶的閩南，开始作逐利之計。我不滿这种軍閥割据作风，便离开漳州回到广州。

經過孙中山炮击莫荣新这一幕之后，孙偕朱执信到了上海，当时孙左右的一班高級干部都一致埋怨朱执信，說朱不应独自密贊孙而助成炮击事件。又說朱不肯改去“綠林民軍”的作风。一九一九年夏間，我接到朱先生由上海来信，要我到上海工作。我于是到上海，见过孙中山、廖仲愷，知道朱先生正在筹办建設杂志。我就在这杂志社里面做发行业务工作。朱先生的革命理論，我在此学习了不少。

是时刚在“五四”运动之后，胡适及其附和者已表露他的思想；把新文化运动局限于白話文运动。朱先生就感到这是“新文化的危机”，他曾这样說：“階級斗争是现存的事实，不是想出来的手段”。他斥責空談“奋斗”，而实际反对階級斗争的那些人們。他对知行的說法，比之孙中山先生似有較深認識，他說：“真正學問，是同社会有脉絡貫通的，同实际生活联成一气的，沒有做事，他这學問是悬空的。”他对于群众运动也有較进步的看法，他认为“群众运

动真实的力量是多数的意志力”，他觉得当时“不留名声，不留目标”的一类群众运动促进者实在太少。他创办建设杂志是在于对群众运动作思想教育。其时孙中山及其左右已开始认识“联赤”与“扶助农工”的重要，当然除了朱执信及廖仲愷之外，其他还是主张由资产阶级领导革命的。

孙中山希望取得苏联革命成功的经验，他决定派朱执信往苏联考察，并指定我做朱的助手。朱先生和我即做些准备工作并学习俄文、俄语。但是到一九二〇年十月粤军从漳州回粤驱逐了陆荣廷、莫荣新，在广州恢复“护法政府”。朱执信即随孙中山返粤，赴苏联考察计划无形打销。朱返粤不久，突然被刺，他的遇害，是革命的一大损失。其后，我借着机会由廖仲愷先生指示并给我旅行所需的资料，我终于到达了苏联伯兰俄维辛（当时称远东共和国）因为其时赤塔有战争，我不能完成我的旅行，乃辗转经天津返广州。向孙中山作了一个简单的旅行报告。

一九二一年，我被派到邓铿的陆军第一师工作，任工兵营营长之职。同事中有叶挺、邓演达等。孙中山深感革命进行不能停滞，于是准备出兵湖南，进行北伐，把当时在广西的滇、赣、粤各军集中，在桂林设立大元帅府行营；但坐镇广州的陈炯明别有企图，他暗中勾结了吴佩孚，秘密破坏北伐军事。在广州的将领有实力而最积极革命者只有邓铿一人，孙遂嘱邓在其部队中挑选青年干部组织警卫团，随帅府行营任警卫之责。以三个步营及机枪一连编成为警卫团，陈可钰任团长，我任副团长，因陈可钰兼任师部参谋长，不能离开广州，故警卫团实际由我率领开赴桂林完成任务。其后警卫团扩成两团，我任第二团团长兼大元帅府参军。

正在桂林布置北伐军事，准备由全州入湘之际，而陈炯

明破坏北伐的举动渐趋显著，他断絕了北伐軍的后方接济，竟纵其部下暗杀了邓鏗。这个暗杀消息一到桂林，大家都知道局面破裂了。孙中山遂率领警卫团回粵。陈炯明则避回惠州。孙仍图感化說服陈炯明，但陈已包藏祸心，命洪兆麟、叶举等起期作乱。于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五日夜間围攻观音山总统府。警卫团寡不敌众，給他們攻入繳械。孙中山事先已化装避至永丰舰，次日我亦逃至舰上。舰队集中黄埔坚持一个多月，同时号召北伐軍由北江回师反攻。其时廖仲愷先生已被誘捕于石龙，北伐軍一时未能回穗，孙中山乃离粵赴上海，在此时期，中国共产党創始人之一的李大釗和孙中山会談了两天，給孙中山以很大的影响，續后孙中山接待苏联特使越飞，經過商談之后，表示接受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援助，发表了有名的“孙越共同宣言”。

回师广州未成的北伐軍，由許崇智率领越江西边境攻入福建，把北洋軍閥李厚基打敗，占领福州，成立东路討賊軍总部。我就被派到福州任总部副官长职，蔣介石荐委他的亲信刘峙，願祝同到副官处当副官。那时我对蔣介石还很客气。

一九二三年二月东路軍由閩回粵，时广西的杨希閔、刘鎮寰已攻走陈炯明，占据广州。孙中山重返广州。一九二四年一月，举行改組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体现三大政策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国革命便得到了比过去进一步的发展。在此期間，我已辞去軍事职务，跟隨廖仲愷先生做些零碎的党务工作。

在一九二四年至二五年間，經過了有名的省港大罢工，經過了镇压商团暴动，帝国主义惊惶失措。一九二四年底，孙中山为了和平救国，北上会晤段祺瑞，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病逝于北京。其后廖仲愷先生又遭反动派暗杀。中国

革命运动受到了重大损失。我精神上所受到自有生以来的极沉重打击，实难以言语形容。

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蒋介石被任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宣告开始北伐。可是在此以前，即孙中山逝世不久，国民党的右派邹鲁、谢持、林森、居正等召开了西山会议，公开反对三大政策。另一派以蒋介石为首的罪恶集团，表面伪装拥护革命，暗中组织反革命活动。（最清楚的事实是：迫走苏联友人基散加，用武力围住东山一带的苏联友人各住宅，并挟持汪精卫，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做出来。）到后来，北伐军到达上海，即为帝国主义所收买，立心做帝国主义忠实走狗，发动了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的大叛变——“清党”大屠杀。

在一九二六年二月，我任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倾向进步，与中共同志杨殷、杨匏安、邓中夏经常联系。我认为警察应与群众建立亲密关系，于十月间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工警联欢会，我强调工警合作。不料却为张静江（当时国民党中央党部主持后方负责人）所不满，传召我去见他，当面责骂，说我言论太左，“举动乖张”。他随即密电蒋介石，要我辞职，我就实行辞退，由蒋介石派钱大钧来接任。我的辞公安局长职，意味着广州政治气压的低沉，进步群众预感到逆流迅将到来。我自此一辞职之后，即在香港隐藏居住。其时杨殷曾到香港访我，挽我出来工作，我那时徬徨歧路，未敢即时答应。不久，“清党”屠杀竟尔开始。

一九二七年张发奎率军南下，反对李济深支持汪精卫。我于那年十一月初，由香港返广州，会见了张发奎。匆促间，往福州走了一次，主要是劝蒋光鼐、蔡廷锴等与张发奎合作，但无结果。这里，我得回溯一下，当孙中山逝世与廖

仲愷先生被害之后，没有一个像朱执信那样的人。在我心目中，汪精卫是比较进步的。当然，后来我发觉他是投机善变的人物，就与他疏远了。当在蒋介石暗中组织反革命活动时，他却自认为“革命派”，并认为“无论共产党、非共产党，都应一致努力为革命而奋斗”。这些话是很动听的，我也或多或少被他的话吸引了。是年十二月十一日，广州公社起义，我于次日即由广州回到香港。一九二九及一九三〇年汪精卫在北京、广州发起并举行过扩大会议、非常会议，汪派陈公博、沈崧前后携函邀我参加，（我还记得，汪在赴北京时亲笔给我的函里有句话：“国家民族之安危，革命大业之成败，在此一行，个人荣辱得失非所计也”。（此函我在香港时曾给朋友陈此生看过的。）我都婉词推却。但在反蒋意义上，只接受他委托赴赣州，劝陈铭枢、蒋光鼐联合陈济棠反蒋，但无结果而回香港。

十数年来，蒋介石专横独裁，狂暴凶恶，固非推翻他的统治不可，但经过多次国民党内部反蒋事件，我对革命有进一步的认识，深觉得非从根本上进行变革不可，所以我对于汪的改组委员会及胡的新国民党组织等根本不同情。

蒋介石的剿共卖国政策，使中华民族蒙受了空前的灾难。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爆发了沈阳事变，蒋下令不抵抗，转瞬间而东北全部淪陷。翌年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团结抗日。这一正义的呼声，使我很受感动。“一·二八”前夕，我承蒋光鼐之邀，到了上海，不数日，十九路军发动了淞沪抗日战争，我以私人资格协助。这次战争为蒋介石叛卖而结束。

一九三二年冬间，宋子文着陆文瀾携函并蒋介石的亲笔函到香港访我出来做事。陆文瀾说：“蒋介石拟发表蒋光鼐为

福建省府主席，蔡廷鍔為福建省綏靖主任，要我當福建省府委員兼秘書長”。我作過這樣的考慮，就是說，經過淞滬抗戰的十九路軍，其中可能有些分子是積極反蔣的，因此我就答應了他。過了若干日子，蔣介石電催我到漢口，向我說明閩省府人事安置情形，隨後就把名單全部發表了。我到福建就職後不久，見諸事困難，情況複雜，我雖然替他們起草過一個“粵、桂、贛、閩四省聯盟約章草案”，但不能真正實施，我於是請假離開福州回到香港。及至福州革命起事前十餘日，我由香港到福州，參加福州革命政府任中央委員兼政治保安局局長職。當時有些人對於完全站在國民黨外反南京這一問題，似乎仍有多少顧慮與猶疑，主要是為着怕粵、桂、閩聯盟破裂所生之後果。我覺得這回事情無可遲疑的，粵、桂、閩聯盟徒有其名而已，後來福州革命宣言一發出，桂派就來反對，足証所謂“聯盟”實在是无基礎的。我建議應立即宣告脫離國民黨，重新組織革命政團，進行革命，大家推我起草脫黨宣言，並由我領銜發出。福州革命軍事失敗，大家又推我趕快到香港見胡漢民商量善後收拾辦法。我到香港見胡之時，適孫科亦在座，胡則婉言權不在己，孫則直接責難，我遂無言而退。此後我參加了民族革命大同盟的組織，又與何思敬等組織救國會南方總支部，鼓吹抗日救國。

一九三七年“七七”抗日戰爭發動，全國無分南北老幼，奮起抗日，我以救國會負責人資格鼓吹堅持團結，堅持抗戰。一九三八年十月，廣州陷敵，余漢謀退北江，我集合同志，策劃組織抗日武裝。適值葉挺辭“廣東第四游擊司令”職，“四戰區”命我繼任，我到深圳設立指揮機構，領導工作，但游擊隊伍大部分散，又恐漢奸混入，使組織不純。最純潔而組織化紀律化的只有曾生、王作堯部隊，他們

部队在斗争中日趋坚强，在坪山一带长期坚持，直至日寇投降。大家都知道，在蒋介石充满反动性的消极抗日政策下，纯洁的游击队，无法获得政府方面接济的，惟有当地人民群众努力出来支援。我在深圳不到两个月，被调回韶关，改任“四战区军法执行监”兼“战地党政分会委员”，不久，又被迫辞去“军法执行监”，去职的原因，是我不肯填表重新加入国民党。那时蒋介石命他侍从室严令所有军事单位转令一切军职人员入党编组，不得违背，否则受处分。我向张发奎说：“我既在福州时声明脱离国民党党籍，此时无理由填表加入”。张于是命余愷湛转知我，令我赶速递辞呈，我就这样去掉军职。

一九四一年初，皖南新四军事件发生，一时政治气压低沉，特务分子时常向我攻击，在某次集会上，黄麟书公然打击我的发言。其时民主人士陆续聚集香港，我遂离韶赴港，会见了邹韬奋、杨东蓀、千家驹、陈此生等，梁漱溟亦到港活动，酝酿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开办光明报，梁强调反对一党专政。我被推入内地活动，相机商请李任潮出来主持。我重入内地留住韶关，接得梅龔彬由桂林来信，谓任潮先生有民联民促之议，故民盟之议不作正式提出。其后，杜斌丞先生到韶关访我，意见相合，我随即到桂林，会见了梁漱溟、李任仁、陈此生等各位先生，商谈结果，拟定了民盟组织的初步计划。

一九四一年，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我在韶关一连两年多时间，与桂林交通阻隔，韶关环境恶劣，民主运动无从展开。至一九四四年底，韶关疏散，我迁到梅县，与张文等以及抗日先锋旧日同志大家时常商讨加强地方抗日武装问题。民主进步势力不弱，但因当地反动分子严密侦查和监视

我們，遂致工作不能大量展开。迨“八、一五”日寇投降，我从梅县返广州，建立民盟南方总支部，与丘哲、张文等积极展开民主运动。

在日寇投降不久，蒋介石又要掀起罪恶的内战，我們民盟的主要努力，是响应中共号召，坚持和平、民主、团结，我們的努力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蒋介石乃运用其惯用的欺騙伎俩，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签订了“国共双十协定”，通过了决议，但不旋踵都一一加以撕毁。一直到发动内战，始终受美帝国主义指挥操纵，其卖国行为，固非一朝一夕的事情，于此又足见美帝国主义之阴谋侵略。其时美帝战贩马歇尔正在指挥操纵。广东方面反动当局随着局势恶化而拚命压迫民主进步力量，特务捣毁了兄弟图书公司和华南报广州分社，当时，我尽我之所能，在惠爱路旧大新公司召开书报界及各方代表的座谈会宣布此事。又打电话给张发奎，请他禁止这种猖狂态度。及后，谈到东江纵队问题，张发奎还不承认广东有中共所组织的游击队，我和他辯駁了一番，結果，东纵被迫北撤，跟着华南报广州分社被封，民主进步人士被迫害，日漸加剧，我和民盟南总全部迁到香港，继续工作。

内战一天天扩大，反动气焰一天天高涨，各方民主人士相继跑香港，策动民主运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国民党民主派由李济深领导在香港举行代表会议，筹组革命委员会，我以政见相同，乐于参加。一九四八年一月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声明脱离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关系，反对独裁，反对内战，主张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与各民主党派携手前进。我被推为中央委员兼任秘书长。值其时，我患心脏病相当严重，卧病澳门，然经常扶病过香港参加会议。一九四九

年春，我由香港乘輪北上，到了初解放的北京。途經石家庄时，见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等，非常欣慰。在北京参加人民政治协商會議筹备委员会，正在准备出席人民政治协商會議，突然心脏病复发頗剧，因須請原經手疗治之医师，不得已乃复返香港。接北京电报，知道我被推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一九四九年十月，广州解放，我被任为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任广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之职。

这就是我四十年来政治生活經過从片断中的大概叙述。